

第一章 语言与人

人按照其本质倒的确要被交给语言——人是“语言的”。“语言的”一词用在这里表示已经从语言的说中产生了。那如此产生出来的东西，人，就已经被语言带入语言自身。也正因此，人一直被托付给语言的本质：寂静的轰鸣。……只有归属于寂静的轰鸣，凡人才能够以其本几的方式用声音说话。

海德格尔《诗 语言 思想》

20世纪人类文化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语言研究成了人文科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领域，不同学科的科学家用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而语言正是人类创造的最完善的符号体系。

第一节 人的语言性的生物学考察

语言和人性的关系有着生物学和发生学的基础。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之所以具有语言活动的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人的言语器官。

从表面上看，人类的发音器官和其他动物的发音器官有不少相似之处，

例如都有嘴、唇、舌、牙、颚，都能将这些器官用于进食和发音。但是只有人类的发音器官才能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现代神经语言学对婴儿、非人灵长类动物和成人的发音所作的声学分析表明，婴儿的发音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相近，它们的舌头不大活动，发不出 [i]、[u]、[a] 这几个音。因为婴儿和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声带位置都比较高，减少了咽腔的体积。而成人则不同。神经语言学家又用电脑模拟人类远祖发音器官的发音能力，发现非洲南猿、尼安特人和现代非人灵长类动物以及人类婴儿一样，都不能发出 [i]、[a]、[u] 等音素。可见，无论从个体发生还是群体进化上看，人类的发音器官都经过了一个“专门化”的过程。

不仅如此，现代神经语言学还证实，至少有 100 根肌肉在人脑的指挥下控制着发音器官。正常的说话速度是每秒钟 14 个音素，这就意味着大脑在 1 秒钟之内需要向肌肉发出 14 条指令。由于发音器官的各个部分与大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例如从言语中枢发出的神经脉冲到达喉部肌肉的时间比到达口腔肌肉的时间要多 30 毫秒。因此为了协调各项指令的适当的速度和次序，人脑更需要一个精密复杂的机理。例如为了协调喉部和口腔的动作，人脑发到喉部的神经信息就应略早一些。由此可见，与发音器官相联系的人脑神经系统也经过了一个“专门化”的过程。

人类是惟一具有语言专门化功能的生物学基础的物种。

一、儿童语言发展的生理基础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首先得到儿童语言研究的进一步阐述。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儿童生下来只有一套非常有限的行为型式。它是一种遗传的心理功能。它决定了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并向环境学习。皮亚杰称之为“功能的不变式”(functional invariants)。儿童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首先用他们已有的结构去创造新的用法，去理解新的话语。例如一个儿童和妈妈外出，看见路旁的蒲公英花，妈妈说这是 dandelion，儿童马上想起他最近去过的动物园，那里的狮子被人称为 lion 而他却称之为 yaye。这时，儿童会用他已有的模式去“同化”眼前的蒲公英，惊恐地叫“yaye, yaye”。但在环境的教育下，儿童又会“适应”成人的模式，把狮子称为 lion，把蒲公英称为 dandelion。儿童用以“同化”环境的这种功能不变式，反映了人脑的一种内部结构，反映了人类的先天的认知能力。

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这种先天的认知能力，对于儿童的语言学

习来说，就是一种天赋的语言机制。儿童能够习得语言，是因为他们听到的语言材料可以激发起一套具体的天赋结构，它包括一套语言知识和语言分析的普遍过程。如果没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儿童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母语。因为儿童日常听到的话语中有许多不规则现象，如果没有预设的对语言的概括了解，儿童不可能从周围纷繁而不规则的话语中归纳出语言的抽象体系。儿童运用他们与生俱来的语言知识在他们的语言经验中进行各种假设，经过反复修正，达到内化了的语法。乔姆斯基明确指出，人的语言机制是天赋的，而人的其他行为不是天赋的。而且语言机制只作用于语言表达，并不支配人类的其他活动。语言只属于人类，动物的交际信号与人类语言的复杂性不可同日而语。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在心理语言学对儿童手势语的研究中得到论证。研究者在记录了六个聋孩（其父母均有听觉）各自所发明的手势语后发现，这些手势语从内容到结构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路线，即先是单词话语，然后是双词话语，最后才是复杂的句子。这一过程与能学说话的儿童和能学手势语的聋哑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相同。而这些儿童的父母都不相信手势语的用途，因此这些聋孩所用的语言并不是来自其父母，也不属于正常的听说系统。例如儿童先指向一只鞋，然后再指向桌子，意为“把鞋子放在桌子上”。又如儿童张开手掌表示“给”，然后再指向自己胸前表示“(给)我”。他们最初创造的手势语都有关动作的方向，然后才是有关属性。心理语言学家认为，这些自创的儿童手势语和正常儿童的语言可以用一套共同的格语法加以概括。不管是在如何困难的环境里，儿童都有某种自然倾向和能力去发展一种自成体系的交际系统。这种带有“本能”性的倾向和能力使人们确信语言能力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演化的一大成果，“人类都准备学习语言”。

心理语言学对儿童学语言的生理基础的研究也表明，从发音器官来说，人的牙齿整齐，吻合无缝，唇部肌肉发达、灵活，口形较小，张合迅速，这一切都是为发音而生就的。从神经系统来说，儿童发育时期，语言能力受大脑右半球的支配。这时，如果大脑左半球受伤，语言能力就留在大脑右半球。在2岁到12岁之间，儿童语言能力从大脑右半球转到左半球，发生“侧化”。

① Don Slobin, *Psycholinguistics*, Glenview, Illinoi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79 pp. 131—133.

(lateralization)。侧化之后，如果大脑左半球受伤，就失去语言能力。儿童学语言的发展过程与其身体的发育过程相一致，大体都在一岁半至六岁之间。过了这个时期，再学话就有困难。儿童的智力各有高低，但学语言的过程基本相同，即两三个月开始学发音，六七个月以后开始能听懂成年人讲的简单话语，一岁以后开始说出有意义的单词，两三岁开始能使用独词句或双词句，四五岁以后词汇、语法开始丰富。这样一个基本过程表明人的语言能力是靠遗传而与生俱来的。

不仅是儿童语言发展中的共性规律证实了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而且儿童语言发展中的个体差异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家在研究双生子的心理学，探索遗传和环境如何作用于儿童智力的发展时发现，遗传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②：一是通过素质影响智力的发展；二是通过气质类型的因素影响儿童的情绪和性格。就语言而言，他们调查了这样一个一胎三婴的情况：老大老二为同卵，老三为异卵。三个婴孩出生后在同一个环境抚养，语言能力的发展却存在一定的区别：同卵之间一个样，异卵之间又是另一个样。老三六个月就开始发“爸”“妈”的声音，七个月以后就能较清楚地叫“爸爸”“妈妈”，语声较粗。老大、老二却晚两个月才能叫“爸爸”“妈妈”。他俩发音时间接近，语声较尖。这表明遗传因素越近，语言习得的相关系数就越大。这一点在对双生子的运算能力的测验的研究中同样被证实了。

二、人脑机制的语言功能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又得到神经生理学的证实。神经语言学家在检查三个月龄之前死亡的婴儿的大脑时发现，大部分婴儿的颞平面左半球大于右半球，而左半球正是专司语言功能的。这表明在婴儿会讲话之前，大脑的生理基础已有了语言的先天准备，这种准备甚至在胎儿身上也可以发现。神经语言学研究还证明，大脑中与语言功能有关的那些区域比大脑其他部分成熟得晚一些。这表明这些区域是在进化的历史上比较晚近才形成的。

^① E. H. Lenneberg,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 of Language*, in R. Oldfield & J. Marshall (eds.): *Languag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8)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林崇德等的文章。

为了探索人脑左半球与人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联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了失语症患者。失语症患者因脑部遭受损害而引起话语障碍。脑部不同区域的损害会引起不同的语言障碍例如在左脑的布罗卡氏区受损害的情况下，病人能理解语言的含义，但说话困难他们说出来的话就像电报的语言，省略了介词、连接词，有时甚至省略了名词、动词的尾部变化，只讲出主要的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例如让病人描写他看到的一幅图画，他只能说出孤立的名词来；让病人读一些虚实同音的词，如 would 和 wood, and 和 end 病人读出了 wood、end 这类名词，却读不出表示语法意义的词。这说明布罗卡氏区和人的语言能力中的语法相联系。由此产生布罗卡失语症。

在左脑的维尔尼克氏区受损害的情况下，病人发音没有困难，句法也正常，但很难说出物体的名称，因而说话内容空洞，没有意义。病人的语言理解力也显著衰退。这说明维尔尼克氏区和人的语言能力中的词汇相联系由此产生维尔尼克失语症。

神经语言学家认为，布罗卡氏区的功能是把语言映象转换成说话所必须的肌肉运动，而维尔尼克氏区的功能是把声音转换成语言的意义。

三、人与动物语言能力的本质差异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还得到对动物学习语言的实验的证明。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尝试着训练黑猩猩学习语言。黑猩猩是最聪慧的类人猿之一。实验表明，黑猩猩的发音器官没有说人类语言的生物基础，一只小猩猩花了 6 年时间才会发 4 个像英语词的声音。但黑猩猩能够掌握其他符号语言，如手势、各种形状和颜色的塑料等，由此获得一定的“语言”能力。例如：

名词性符号概括：黑猩猩学了“狗”这个词后，凡是看到一幅狗的图画，或是听到狗的吠声 都会做出“狗”的手势。

动词性符号概括 黑猩猩联系开门动作学会“开”这个词后 会用这个词来要求打开各种容器或水龙头。

符号义引 申 黑猩猩看见苦艾酒的广告 会做出“喝”的手势。

符号创制：黑猩猩创造了“喝水果”这样的手势来表示西瓜。

符号位移 黑猩猩学会了“巧克力糖”和“颜色”这两个符号后 实验者用这两个符号告诉它褐色就是巧克力糖的颜色。当它看到表示“拿褐色”的两个符号时，就会从一堆颜色不同的小圆盘里找到褐色的小圆盘。这说明有

些黑猩猩已能用符号来谈论当时当地不存在的事物。

符号组合：一只叫 Sarah 的黑猩猩能够理解一些符号组合结构。看到“Sarah、香蕉、提桶、放”，它就会从水果中选出香蕉，从容器中选出提桶，然后把香蕉放在提桶里。看到“Sarah、香蕉、提桶、放、Sarah、饼干、盘子、放”，它也能按指令去做，甚至看到“Sarah、放、苹果、饼干、盘子、提桶”这样复杂的句子，它也能理解。

然而，以上的实验并不能否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本能。

首先，语言能力的基础是智力。人类运用语言的突出能力，部分是高度智力的作用。人脑在无数代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环境条件，本质上不同于猩猩的大脑所赖以发展的那些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创造新生活、新环境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人脑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化，脑机能不断完善，脑高级神经中形成对那些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的适应性不断得到巩固。而黑猩猩却生活在一个几乎一成不变的环境条件下，因而它缺乏包括语言机制在内的人脑高级智力，除非它也经历一个像人脑这样朝高级思维机制进化的过程。然而这种大脑机制的质的变化在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正由于黑猩猩缺乏足够的智力，所以它们彼此接触时没有共同的交际语言，对于语言符号的涵义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不能发展以语言为基础的交流系统。即使在人类的强化训练下黑猩猩能掌握一些手势语，但这些手势数量有限（约一百多个）学习的进度也十分缓慢，学习中带有强烈的实用目的，即从人类获得食物或照顾，而并不具有认识的目的。相反，人类的语言是和认识能力的发展紧密相连的。几岁的儿童都爱用语言来了解周围世界，发现周围世界。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使用的句法结构也就愈益复杂。黑猩猩没有这种需要，它的智力就只能局限在低水平上。据统计，婴儿生下来后大脑的重量只有成人大脑的 24%，黑猩猩刚生下来时大脑的重量却是成年黑猩猩大脑的 60%。人类大脑的增长速度比黑猩猩要快得多，而人类正是在他的大脑走向成熟的时候习得语言和认识世界的。

其次，人类的语言和黑猩猩学到的“语言”有质的差别。人类独有一套完善的发音器官和专门化的肌肉系统，以及向它们发出指令，并协调它们的快速而有机地动作的言语中枢。黑猩猩在人类的帮助下能有一定程度的能力来分析语言输入，将其与头脑中的语义和语法结构联系起来，但这和人类的语言机制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研究动物通讯系统的学者曾认为，除人以外的哺乳动物缺乏人类模仿声音的能力，但是鸟却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进化出语言。因为鸟的语言和人的语言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例如都有目的性，即有确定的意向传达信息给他人，以期改变他人的思想、态度及行为；都有句法，即传递的信息具有内在的组织性和结构的一致性；都有命题性，即都传递信息。然而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指出，把人类语言和动物通讯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是没有希望的。动物通讯系统或采用一组固定有限的信号，每一个信号与一个特定范围的行为或情感状态相联系，如黑猩猩的手势语；或用一组固定有限的语言维度，在这个维度上选定了一点就决定和通报了非语言维度上的一个确定点，如欧洲的知更鸟用高低音调的变换速率来表达它防卫自己领土的意图。然而，即使动物通讯系统具有无限多的潜在符号，像人类语言系统一样，但它的机制和原理仍然完全不同于人类语言。对于使用语言维度的动物通讯来说，它原则上允许语言维度作连续的变化，而事实上人类语言却是分离的。因此，这里不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完全不同的组织原理。当我们说“跨国公司的兴起对人类的自由构成一个新的危险”时，我们并没有沿语言维选择一点来通报与此相关的非语言维上的另一点，也没有从先天的或习得的一个有限的行为储备库中选择一个信号。人类语言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理上，它是独一无二的，与动物世界没有什么类似之处。在乔姆斯基看来，提出解释人类语言怎样从较低智力水平的、更原始的通讯系统中进化而来这一问题，就像解释从基本粒子之中“进化”出原子一样荒谬和没有意义。

第二节 人的语言性的社会学考察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不仅在生物学的平面上得到肯定，更在社会学的平面上获得了更为深广的内涵。人只有当他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有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内在冲动。人类语言正是以人类社会为前提的。黑猩猩的“语言”与人

①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U. S. A. 1968

类语言的质的不同，不仅因为黑猩猩缺乏必要的生物基础，而且因为黑猩猩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生活在自己的种群中的黑猩猩是不能自发地产生和使用人类语言的，哪怕是最简单的手势语。

一、人的社会本质高于生物学范畴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群居的社会动物。人要求加入群体的愿望以及由这一愿望促成的对周围环境的自觉探索必然表现为对交际媒介的追求。而语言正是把人与自然、人与人联系起来的一个纽带。语言为一个初降尘世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提供了把他与同类所在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的可能的途径。儿童学说话在本质上是学做一个社会的人，学着掌握语言所包含的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动物的“语言”也有联系同类和自然界的功能，但人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人与人之间不但有血缘、种姓的关系，而且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对自然界不是像动物那样简单适应，而是不断地在改造中适应；这一切都包含在人类语言中。对于一个新生儿来说，这一切并不是用遗传代码的形式传给他的，而是在社会环境中传给他的。

中国辽宁山区曾发现一个年满十岁的女性“猪孩”。因父母离婚，无人照看，家里的几头猪常在屋里喂养，女孩从会爬开始就与猪为伴，一块玩耍并吃猪奶、猪食充饥，夜里与猪同睡。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这个猪孩没有人的语言。印度发现的“狼孩”由于从小脱离了人的社会环境，它的大脑反映外界的机能已在动物群中定型。当他回到人类社会时，尽管得到为表现出先天普遍的语言能力所需要的相应的刺激，他仍不能掌握语言。人脑本身不只是自然发展的产物。

人脑不同于动物脑子的重要区别之一是人脑发展速度快。猩猩在刚生下来时脑子已相当完整，而初生婴儿的大脑重量只占成熟人脑的四分之一，而且各种神经之间的线路远没有连接起来。人脑结构和机能是受后天社会环境的支配才完善起来的。就像种子需要肥沃的土地，人脑机制需要社会环境的刺激。一旦被剥夺了语言、思想、交际的社会环境刺激，人的语言能力也就丧失殆尽。

心理学家对儿童掌握语言作了大量观察后发现，儿童掌握语言形式要素的过程，同形式要素出现的频率或语音形式无关，而与形式要素反映的客观现实有关。例如学习英语中表示复数的-s 要比与它同音的动词单数第三人称词尾学得快一些。这说明人脑只是心理器官，是心理产生的必要条件，

但它自身还不能产生心理活动。人的心理发展是由外部世界，其中主要是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语言能力是潜在的，它的基本性质是生理的、心理的。但语言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语言能力的外化也只有能在能动地反映现实和积极的交际过程中才有可能。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属性，正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本质、交际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从这一观点看语言和意识的产生 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二、人与动物交际系统的本质差异

无可否认，动物也有交际行为。现代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昆虫还是脊椎动物，都普遍存在可以分解为多种社会性联系的交际行为。如 J·P·司各特指出：“交往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基本过程，因为社会行为本身的定义就是由同种动物其他成员所激起的，或对同种的其他成员有影响的活动的。”但动物的交往往往是利用特殊的视觉信号（如荧光）嗅觉中介（如外激素）即使有些动物能发出听觉信号 这些信号也不具备“延迟模仿（原型消失之后的模仿）移位”等认知机制 不具备能产性（即不能用这些声音组成新的信号）。已有的研究表明，动物的交际系统可能具备与人类交际系统共有的一些特征，例如：

声-耳渠道——灵长类动物通过声-耳渠道进行交往，可以使大部分身体腾出来，在表达意思的同时从事其他活动。

四散传播与定向接收——一个语言信号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被任何耳听系统所接收，而且一般还可以通过双耳辨别方位的功能把声源的方位确定下来。

迅速消逝——一个语言信号不会逗留在那里等着接收者从从容容地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 34 页。

参见 D·A·德斯伯里等主编《比较心理学》，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参见 C·F·霍凯特《言语的起源》，王士元主编《语言与人类交际》，广西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

接收。

互换性——讲某种语言的人能够复述出他自己能理解的任何语言信息。

整体反馈——讲某种语言的人可以听到他自己所讲的话中与语言有关的内容。这种反馈使交际行为内在化，从而形成思维。

专门化——躯体的作用与言语扩散的音波只具有信号的功能。

语义性——语言信号与周围世界中反复出现的特征、情势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联系。如长臂猿发出的危急的叫声也有语义性。

任意性——语言信号中有含义的信息元素和其含义之间的结合可以任意确定。

分离性——尽管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很多种不同的声音，但语言信号只运用相当小的一套声音系列。这些声音系列之间在功能意义上具有绝对的差异。

以上九种特征是动物交际系统在向人类交际系统的演化中所能达到的极限。它比较全面的反映在原始类人猿的交际系统中。然而，只有人类才演进出交际系统的另外一些重要的特征：

替代性——只有人才能谈论在空间或时间上远离谈话地点的东西。这在与人的血缘关系最近的生物所具有的有声符号里都是缺乏的。

孳生力——只有人才能谈论从来没有人讲过或听说过的东西，并能被讲这种语言的其他人所理解。人们能够把过去那些熟悉的话语集合在一起，按照以往所熟悉的各种句型来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话语。类人猿的一个声音信号只是它的极其有限的叫声中的一种，其交际系统是封闭性的。而人的语言是开放性的、有创造性的系统。

模式二重性——当一个交际系统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有意义的成分（语素）时，这些基本成分会彼此间在发音上越来越近似，而任何生物能够辨别出的不同刺激物在数量上都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少量可以辨别但本身没

例如，一条狗拖着舌头喘气，偶然也发出声音，于是其他狗或人知道它在哪儿，知道它的感受。然而这一行为的主要功能是降温，“狗热”这一信息的传递完全是一种附带性的作用，它不具备符号和‘语义’的性质。

例如，英语的 pin(别针)和 bin(箱子)这两个词听起来只有一点不同。假如讲话者发出一个音节，这个音节由 pin 的正确发音向 bin 的发音方向偏离，那么他并不是在创造第三个词，只不过是含混地说出 pin 或 bin 罢了。听话人会按照上下文意思将它补正为 pin 或 bin，否则就不能理解它的意思。

有意义的音素排列组合成各和不同的单位模式，才能有效地体现日益增长的语素

传统传导——人类的基因具有获得语言的能力和很强的动力，但人类语言所具有的详尽细致的习惯用法要靠后天完备的学习和教育来传授。

我们也许可以想像，一只早期类人猿看见一只猛兽，而自己没有被对方发现，这时因为某种原因（也许是恐惧）它悄悄转回身来向它的伙伴们走去，过一会儿才发出表示危险的呼叫声，这就给全体伙伴更多的机会避开猛兽。这种具有生存价值的“延迟”呼叫，由于其结果是幸运的，因而在交际系统中巩固下来，使交际系统具有了“替代性”特征。

我们也许可以想像，一只早期类人猿用 AB 叫声表示觅到食物，用 CD 叫声表示遇到危险。当它同时见到食物和猛兽时，它会迅速发出 ABCD 或 CDAB 甚至 AD 或 CB 这样的叫声，表示“食物与危险兼在”。如果它最终用 AD 来表示这个意思，那么原有的 AB 和 CD 叫声就进入一个新的系统，分别表示“有食物而无危险”和“有危险而无食物”。这三种叫声都具有复合性，它们分析为更小的意义元素，即 A——食物，B——无危险，C——无食物，D——危险。于是交际系统开始有了孳生能力，就像儿童第一次讲出不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话语，迈出了交际系统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早期的封闭系统变成了开放性的、有创造力的系统。

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像，早期类人猿像人类发明电报那样，只需区分两种长度的波动和三种长度的停顿，就可以用这些无含义而区别明显的基本成分排列组合成丰富的电码，从而使交际系统获得空前的效能和灵活性。……

然而，只有人类真正越过了类人猿交际系统的这些局限，真正进入交际系统的“语言”层面，从此开始了崭新的、被称作是人类的生活型式。这是由人类的生存和交际水平决定的。一些研究动物交际的学者曾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界的交往划分为六个水平，即植物水平、振奋水平、时相水平、信号水平、符号水平（灵长类动物以姿势、面部表情和声音等形式产生的反应类型）、语言水平。其中只有语言水平才是人类社会中的特有的交际行为。

例如，英语中 tack(平头灯)、cat(猫)、act(行为)这三个词就是由毫无意义的三个基本音素的不同排列组合来代表不同的词义的。

有关研究参见 T. A. Sebeok 著 *Animal Communication*，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75—102 页。

三、语言水平的交往：人与动物的分水岭

语言水平的交往是人与其他生物的交往行为的水分岭。“动物之间，甚至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①人类学的研究证明：人的音节分明的言语是从与日常生活动有关的声音发展来的。这些声音曾伴随着高等类人猿的日常的行为动作，以后这些声音的数目随着捕获食物时活动形式的种类的增加而逐渐增多。“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楚的音节。”与此同时猿类也扩大了各种表象的范围。这样，言语前的阶段也就过渡到行将言语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基本的音韵，随着音韵也形成了基本的概念。言语的发出正是在有意识地制造最原始的石器工具的时期开始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了人的脑髓。”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还说：“人天生宜于发生音节分明的声音——上帝既然意在使人成为一个社会的动物，因此，他不仅把人造得具有某种倾向，在必然条件下来同他的同胞为伍，而且他还供给了人以语言，以为组织社会的最大工具、公共纽带。”

语言水平的交往不仅是人的交往行为与其他动物的交往行为的一道划界的“门槛”而且是人类原始思维由动作思维到表象思维最终进入语言意向思维的一个分水岭。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类的符号—认知发生过程中，心理表象和图画表象作为语言符号的前身，只是一种“前语言阶段”。当人类的动作思维摆脱“行为”的羁绊把思维的外壳从身体活动转向心理表象时，就为更加抽象化的语词概念思维的发生奠定了必要的心理基础。观念和思维这些较高级心理层次的信息参与到解决问题情境的运演中来。人类的符号功能随之发生了质变：语言系统从原始的叫号信号中迅速超升，发展成为具有开放性、能产性、双向交流性和抽象性等基本特征的新的代码符号，这使人最终成为人，因为人开始了他所特有的符号活动。而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1页。

②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3页。

在这之前，人只能以手势、姿势等动作语言和面部表情来进行交往^①。

对于语言作为人类符号功能高度发展的标志，社会语言学家勒克曼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一提到语言，便在社会交际的发展中跨过了一道门槛。它把社会交际分成‘自然’和‘历史’两个系统。社会交际系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交往重要成分的语言因而无疑是进化过程的结果。但语言是特殊的交际系统，其产生过程不是那么直接……作为历史语言代码的语言并不把种系发生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交际的古老成分完全取而代之。

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语言成为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社会交际系统，并取代了过去作为主要代码的原始形式，但社会交际古老组成部分的一些要素，如与手势、姿势、面部表情有联系的那些最重要的成分，继续与语言并存。”

第三节 人的语言性的符号学考察

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物种”特征，不仅在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平面上得到肯定，而且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获得深层的规定性。动物只有信号，而没有符号。动物只能对信号作出条件反射，人才能把信号改造成有意义的符号。信号与符号的区别在于，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的一部分，信号在被理解和运用时，总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它作为“指称者”而不是物理实体，仅有功能性的价值。用巴甫洛夫的语言来说，符号语言是信号的信号。“它是现实的抽象化，它可以加以概括，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人类在周围世界及其本身之间的高级定向工具”。从信号到符号，经历了一个从感性信号到抽象理性形式，从携带客体信息的信号到对主体具有某种意义的符号的过程。这时候，外部现实客体内容通过变换而以语言符号系统的方式进入人的头脑，而有一定意义、形式结构的语言符号系统也就成为一定内容

① 参见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T·勒克曼《语言在社会中》载《国际社会科学》1985 年第 4 期

② 《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77 页

的客体在主体观念中的再现。

一、儿童成长的符号化历程

从儿童成长过程来看，一周岁前的婴儿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因为他还没有摆脱动物的信号反应。满月的婴儿的哭叫多少带有一定意义。一个半月的婴儿开始能发生 4~5 个单元音，2~7 个辅音。两三个月的婴儿开始“咿呀学语”，五六个月的婴儿能发出“ma-ma”“ba-ba”“da-da”等音组。七八个月的婴儿能“听懂”成人说的一些词（音调）并做出声音反应。十、十一个月的婴儿开始“懂得”词义，但词很有限，词音和词义亦未达到有机统一，音调仍处于优势，词义的第二信号系统还需要第一信号系统的不断支持。这时候的儿童，如果一旦中断正常的教育和学习，仍有可能接受狼等动物的习性而成为“狼孩”。只有把词的发音和词所代表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说出词”并进行“符号交际”，儿童才真正进入了人的世界。

一位教师曾真实地记录了美国著名聋哑盲学者海伦·凯勒小时候开始理解人类语言的意义和作用时的全新的感受：

今天早晨我必须给你写几句，因为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在她的教育中迈出了第二大步——她已经知道，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称，而且手语字母就是她想要知道的每一件东西的秘诀。

……今天早晨，当她正在梳洗时，她想要知道“水”的名称。当她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名称时，她就指着它并且拍拍我的手。我拼了“w-a-t-e-r”（水），直到早饭以后我才把它当回事儿。……我们走出去到了井房，我让海伦拿杯子接在水管喷口下，然后由我来压水。当凉水喷上来注满杯子时，我在海伦空着的那只手上拼写了“w-a-t-e-r”。这个词与凉水涌到她手上的感觉是如此紧密相连，看来使她大吃一惊。她失手跌落了杯子，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脸上开始显出一种新的生气，她拼了好几次“water”。然后她跌坐在地上问地板的名称，又指着问水泵和井房棚架。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的名字，我拼了“teacher”（教师）一词，在回家时她一路上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中，并且学着她碰到的每样东西的名称，并且高兴得连连吻我。……现在，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个名称了，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她都热切地问着她在家里还没学到的东西的名称。她焦急地教她的朋友们拼写，并且热心地把字母教给她所碰到的每一个人。一当她有了语词来取代她原先使用的信号和哑语手

势，她马上就丢弃了后者，而新语词的获得则给她以新生的喜悦。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脸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富于表情了。

海伦所经历的“新生的喜悦”正是由于语言符号给了她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为她呈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她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准确地说她获得了一个符号世界，一切都生气勃勃起来，都“讲起话来”。

二、人的符号定义

卡西尔曾高度评价人在使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符号化的方法。他指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当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实在之维中。在有机体的反应（reaction）与人的应对（response）之间有着不容抹杀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对于外界刺激的回答是直接而迅速地作出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回答则是延缓了的——它被思想的缓慢复杂过程所打断和延缓。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的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像、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应当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古代埃及人曾把全部过去的时间分为三段，即神的时期、英雄酋长的时期和人的时期。作为人类这三个时期的典型表征，则是三种不同的符号语言。维柯在《新科学》中对这三种符号语言作了论述。他指出，第一种语言是神的心头语言，表现于无声的宗教动作或神圣礼仪。第二种语言是英雄们的徽纹，盾牌就用徽纹来说话。这种语言在军事训练中还保存着。第三种语言是发音的语言，这是今天一切民族都在使用的。在这三种语言中，前两种只是某种象征符号的体系，但它们和日常语言一样成为人类进化

Hellen Keller *The Story of Life*, New York, 1902, 1903, p315. 引自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3—44 页。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 页。

② 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67 页。

的重要标志。

一个世纪前，德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谢夫莱指出，社会乃是“诸有机个体产生在纯心理活动基础上的不可分开的居住地，符号就是纯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它表达思想和技术活动，创造效益，并物化为人的思想产物的外部客体”。当代著名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莱斯利·怀特进一步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象征的使用，”正是象征，它把人类的一个婴儿变成人。”而语言构成人的最直接的象征（符号）世界和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毫无疑问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原所在。

当代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对这一点说得更为透彻。他指出，在人类世界中有一个人类生命特殊标志的新特征，即除了在一切动物物种中都可以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生物体对刺激作出反应）之外，人还有符号系统。动物具有实践的想像力和智慧，而只有人才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像力和智慧。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人类世界的道路。正是人类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才是正确解释宇宙秩序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意义’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正是言语的一般符号功能赋予物质的记号以生气并‘使它们讲起话来’。有了这个原则，甚至聋、哑、盲儿童的世界也变得比最高度发达的动物世界还要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人类生存的公式：人—符号（语言）—世界（文化），在人和世界的联系中，语言符号成为根本的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也有“世界”。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生物体存在的样式。每一种生物体都有它自己的经验，因而有它自己的世界。然而动物的“世界”，只是它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或自然界。低等动物以一种即时即刻的有限方式来应付它们的环境。高等动物有不同等级的学习能力。它们的行为受过去经验的影响。人类将这种影响发展到极致——命名和交际。人类超越了低等动物的简单释放性刺激和固定的行为模式，使知识的形成、巩固、接受、交流、记载有了可靠的载体。在这个意

转引自《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第29页。

同上。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义上，语言是人的心灵的解放，是洞察人类心智的最好窗口。人类通过符号行为确认了自己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根本不同。符号行为使人类的观念中有了时间与空间、事实与价值，事件与意义，思维与想像，实践与创造，理解与交流，痛苦与欢乐。与如此丰富多样的人类世界相比，动物只有“环境”没有“世界”。所谓“动物世界”只是对人而言，只是人类赋予生物群体的一种“意义”。

综上所述，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人性的特点的，是打开人类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中国古代哲人说：“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穀梁传》）“言谈者，仁之文也。”（《礼记正义》）西方哲人也说：“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是和符号的作用不能分离的，即便我们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语言一旦产生，就成为一切观念形态的渊源，直接拥有整个人类心灵。“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结论：除了正常言语之外，其他一切自主地传达观念的方式，总是从口到耳的典型语言符号的直接或间接的转移，或至少也要用真正的语言符号做媒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听觉印象和与之相关的引起发音的运动印象，是一切言语和一切思想的历史渊源，不管追溯它的过程是怎样的曲折。”语言使人类得以超越许多生物性的限制，构成文化模型并传诸后世。人类是在创造语言的同时才开始了创造世界，创造自身的进程。语言不仅拥有人的心灵，它还在一定意义上塑造着人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本质正是加之于自然世界的语言—文化形式。不能设想没有语言的人类、没有语言的实践，没有语言的人类世界。要了解人类及其本质必须先了解语言，因此，语言是人性的最高表现。

参考文献

-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 2 桂诗春 编著《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 3 皮亚杰《儿童的语言与思维》，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

① 莫里斯《符号理论基础》，转引自《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 18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29 页。

萨不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3 页。